

中国古典文学
名著精品书系



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

宋词精品

附历代词精品

吴熊和 主编
肖瑞峰 沈松勤 副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

宋词精品

附历代词精品

吴熊和 主编
肖瑞峰 沈松勤 副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词精品: 附历代词精品 / 吴熊和主编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387-5810-8

I. ①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宋词—选集②词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2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7336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选题策划 邓淑杰
责任编辑 李贺来
装帧设计 李斌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宋词精品 附历代词精品

吴熊和 主编 肖瑞峰 沈松勤 副主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850mm × 1168mm 1 / 32 字数 / 621千字 印张 / 20.375

版次 /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/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6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导 论

吴熊和

词在唐代兴起以后，走上了与诗（包括五、七言古近体诗）并行发展的道路，一跃而为中国诗歌的两种主要体式之一。词与诗互济互补，共存共荣，各擅胜场。中国诗歌也就由此分为词与诗两大支，两者齐轶并进，但又保持彼此不同的体制和特色，形成各自独立的传统和发展轨迹。词在中国有着千余年的历史。唐五代为词的初盛时期，宋代为词的极盛时期，元、明两代绵延不绝，到了清代则词又复盛，余波嗣响，至今未歇。宋词尤独擅一代之胜，与唐诗、元曲鼎足而立，代表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。宋诗、宋文与之相比，固然也并无愧色，但仍不能不推宋词为一代绝诣。

从本质上说，词与诗同属于抒情诗体。但历来论者不是强调诗词相同的一面，而是强调诗词相异的一面，突出两者在体制、题材、风格、语言，尤其是内在质性上的差别，把诗词各自的艺术领域分得相当清楚。

词在唐五代时称为“曲子”或“曲子词”，依照乐曲的曲拍而

采用长短句，主要用于应歌，本是随同隋唐燕乐的流行而兴起的一种音乐文艺，兼有入乐歌辞与新型抒情诗体的两重性质。词以词调为载体。唐宋两代所用的词调，总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。这近千个词调，各有不同的句式、韵律，以及风度声响，绝不相侔。作词需要“按谱填词”。作词所用的谱，有曲谱与词谱之分。曲谱是歌曲谱，是乐曲的音乐形式；词谱则是声调谱，是乐曲的文字形式。凡是“按谱填词”的，当时大都可以入乐歌唱。演唱者多为乐工伶人，主要是公私宴集上擅长歌舞以佐清欢的歌妓，通常以琵琶、笛子、笙箫、箏篪、拍板、小鼓等乐器（以其中一至二种乐器为主）伴奏。这些入乐的词，或“声重于词”，或“词重于声”，其艺术作用是多重性的，并不限于单一。除了它们本身的文学功能，演唱时还具有音乐功能，娱乐功能，甚至社交功能。不过，唐宋词人的创作，并非概以入乐备唱为目的。就唐宋词的多数作品而言，它们是仅有词调而没有音乐的乐章；音乐消失了，然而留下各种文字韵律的词调作为音乐的印记。在唐宋时代原有的乐谱、歌法一概失传之后，情况就更为如此。

合乐与否，固然是“词之所以为词”的一个突出标志，然而却不是惟一的标志。宋词愈到后来，它的音乐性就消失愈多。词同诗一样，具有独立的文学生命与文学价值。词与音乐做伴同行，但词绝不是依附于音乐而存在。从根本上说，唐宋词与燕乐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，对于词体的形成是重要的；但词所拥有的独特的表现领域、艺术手段、美学规范和审美价值，对于词的文学生命来说，则是更为重要的。词的这种质性，不是出于音乐的赐予，而是由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，也是词在长期演进中依靠自身经验与艺术积累不断地丰实完善的。它们才是唐宋词迭经变更而又历久常新的艺术基础和珍贵传统。历代作家对于诗、词两体，往往工拙不齐，独善者多，同能者少，这当然与作家本人的气质才性有关，但更与诗词异体及作家对它们的不同体认有关。

由于词是中国的一种特殊诗体，外语中还没有恰当的传译。英文或译为Ci与Ci、poety（词、诗），或译为Song（歌曲），或译为Lyric Meters（抒情韵律），或译为Length meters（长短韵律），似乎都取其一端，未能包容圆赅。

二

宋代三百余年中，词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。

宋代建国于960年。开头的半个多世纪，中原词坛一直相当沉寂。宋太祖灭西蜀（965），平南唐（975），江南国主李煜，花间词人欧阳炯、孙光宪等相继归宋。从时间上说，李煜后期的词，都已作于入宋之初。不过这类降国群臣之作，仍是五代词的余波，并不是宋词的新声。

宋词的兴盛，始于宋仁宗时期。柳永、张先、晏殊、欧阳修等先后自南入北，开创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宋词新局面。柳永浮沉下僚，张先历任州郡，晏殊、欧阳修则是名公巨卿，他们不但政治地位不同，词风也彼此各异。然而宋词的兴盛，正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群体合力共振的结果。众妙齐奏，汇为巨响。

词作为一种音乐文艺，有别于诗文之类的书面读物。它需要通过声乐传播，尤其需要得到社会各阶层包括中下层的热烈回应，方能传之遐迩，风靡一时。在北宋“急、慢曲子几千数”的乐曲条件和士大夫耽于歌舞宴饮的生活环境中，柳永的词“骫骳从俗，天下咏之”^①。上自宫廷，下至里巷，传唱殆遍，而且声播域外，远传至西夏、契丹与高丽。柳永词现存二百一十首左右，用了一百二十多个词调，多数是新兴的长调慢曲，开辟了由唐五代小令进入慢词的

新阶段。张先亦善于变旧曲为新声，“以歌词闻于天下”^②。张先词一百六十余首，用了九十八个词调。苏轼就特别推许他“细琢歌词稳称声”的本领^③，宋本柳永《乐章集》和张先《张子野词》，都按照宫调编排，当时就是作为唱本，因乐曲众多，乐调美听而传开的。晏殊身居显要，好宴宾客，席上每令歌妓“缓板香檀，唱彻伊家新制”^④。欧阳修“闲居汝阴时，一妓甚韵文，公歌词尽记之”^⑤，至和二年（1055）出使契丹归朝，路过大名，还听到一次为他演出的“所歌皆其词”的专场^⑥。宋词的这种盛况，恐怕同时的诗文都难以达到。柳永“为文甚多，皆不传于世，独以乐章脍炙天下”^⑦。苏轼谓张先“诗笔老妙，歌词乃其余技耳”^⑧。但张先诗集《安陆集》南宋时即已亡佚。晏殊“末年編集者乃过万篇，唐人以来所未有”^⑨，然晏殊的多种诗文集久佚不传，清人辑本仅文六篇，诗七首而已。除欧阳修外，柳、张、晏三家诗文俱为词名所掩，这与词的传播特点当不无关系。

柳永的词，有雅、俗两类。应乐工歌妓之请作词，词中主体并非词人本身，往往以女性（多数是歌妓）的身份、口吻抒写闺中情思，自然不免俚俗。柳永羁旅行役诸作，则自抒怀抱，感慨身世，就近乎雅奏。词自唐代初起，本来有着歌词化与诗化两种倾向。北宋时，这两种倾向一直并行不废。柳永的雅、俗两本，无非就是这两种倾向的不同表现。应歌而作，每求谐俗，后来苏轼、周邦彦词亦都如此。但苏轼也赞许柳永有些作品脱俗入雅，“不减唐人高处”^⑩。北宋词中这雅、俗两类，合乎词体的正常发展，同属于词家正体之一。柳永的词法，宋人称为“屯田蹊径”^⑪，其特色正是“雅不避俗，俗不伤雅”^⑫。张先早期小令，亦清隽，亦浓丽。晚年多作长调，则由妍炼转为疏放。张先期颐高寿。他举进士时，晏殊为座主，欧阳修为同年，三人以词相契。七十岁致仕后，则在杭州与初濡词笔的苏轼相唱

酬，成为连接北宋前期与中期两代词人与词风嬗变的纽带。晏殊、欧阳修皆取法南唐，专作小令，被称为词中的“西江派”^⑬。晏殊的词具有富贵气象，并以真率、温和的心境面对悲欢离合的人生怅触，情既纯至，理亦澄澈，情理圆融，深婉不迫。欧阳修是“一代儒宗，风流自命，词章窈眇，世所矜式”^⑭，他的词集《平山集》早已亡佚。现传见于本集的“近体乐府”三卷和闽中坊刻《醉翁琴趣外篇》六卷，前者经罗泌校订，谨于鉴别；后者真贋杂出，且多艳曲。南宋时曾慥、陈振孙对其侧艳之词都曾为之辩白^⑮。但宋人诗文笔端庄重，以见道德文章；偶作词曲，则每涉帷幕宴私，别具风情，两者本不相妨，实在无须为之隐讳。北宋不少名臣，如寇准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，都以宰执之重，兼擅小词，善于言情，在当时率先起了带动风气的作用。

近人论诗，有“诗莫盛于三元”^⑯之说，上元为盛唐的开元（唐玄宗年号），是李白、杜甫的时代；中元为中唐的元和（唐宪宗年号），是韩愈、白居易的时代；下元为北宋的元祐（宋哲宗年号），是苏轼、黄庭坚的时代。所谓“元祐文学”，实际包括了自神宗熙宁（1068—1077）、元丰（1078—1085）至哲宗元祐（1085—1093）这近半个世纪，是北宋文学最为绚烂的时期。诗、文、词三方面作者林立，彩丽竞繁，流派纷呈。苏轼无疑是骚坛盟主。重要的词人，如秦观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晁补之、李之仪、王诜、赵令畤等，几乎都出入于苏门。他们不但互为声党，还彼此慕习，开启了评词论词之风^⑰。

苏轼的词，经历了一个渐变渐进的过程。熙宁间通判杭州，裙屐声华，多为小令。北上改知密州、徐州，迈往之气拂拂指端，绮罗香泽为之一洗。“乌台诗案”后贬居黄州，意到笔随，境界独辟，纵横所至，无所不可。苏轼独有的词风，终于臻于自然高妙、不可凑泊的

化境。苏词名作，即以作于黄州者居多。《后山诗话》谓“退之以文为诗，子瞻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（万庆）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”^⑧。苏轼提高词品，扩大词境，改变词风，推进词律，“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”^⑨。这是从更高层次上对花间以来绮靡词风勇于革新的积极成果，为发轫未久的宋词拓展了新的前景。对于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，需要有个正确的了解与评判。“以诗为词”不等于混同诗词。苏轼一方面“以诗为词”，正其本源；一方面又“以词还词”，完其本色。改革的结果不是取消、抹煞了词的特质，而是充实、完善了词的内涵。这就是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实质和真正含义。苏诗和苏词，两者体性风貌，自多不同，既不相掩，亦不相让，因而各臻其妙。宋词正是由于不断获得开拓革新，最终形成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格局。

“苏门四学士”中，黄庭坚、秦观成就最高，因而有“当代词手，惟秦七黄九”之称。黄庭坚与苏轼并称“苏黄”，宋诗中的“元祐体”，即指苏、黄诗体。黄庭坚的词，高情旷怀，俱见怡心养气之功。然亦颇染时习，除了“当堕泥犁地狱”（宋陈善《扞虱新话》上集卷三：“黄鲁直初作艳歌小词，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海淫，于我法中当堕泥犁地狱，鲁直自是不复作。”）的艳曲，集中还有不少饮席所用的茶词和汤词（宋时习俗，客至进茶，客散进汤，见朱彧《萍洲可谈》卷一）。秦观的词“专主情致”^⑩，情文相生，语工入律，历来奉为婉约词的正宗。明张綖《诗余图谱》提出词有婉约、豪放两体，分别作为婉约、豪放两种词体的典型。秦观少时豪隽，强志盛气。《淮海集》中的许多策论，慷慨论天下事，笔无藏锋。尤好读兵书。论兵之作，亦论说辩伟。黄庭坚故誉为“国士无双”^⑪。因此，对于秦观不能只看他风流妩媚的一面，似乎秦观所作，都是“小石调”与“女郎诗”^⑫。清姚莹《论诗绝句六十首》有一首论杜牧曰：

“谁从绛蜡银笔底，别识谈兵杜牧之。”这个看法用在秦观身上，亦正适合。

李清照《词论》力主词“别是一家”之说。认为宋初以来众多词人中，真正懂得这一点的，只有晚近的黄庭坚、秦观、晏几道、贺铸四人。晏几道、贺铸的年辈稍后于黄、秦。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子，门第清华而仕宦连蹇，尚气磊落而耽于痴情。他的词多写高堂华屋、酒阑人散的伤感，是北宋中后期小令中的上品。黄庭坚为他的《小山集》作序，称其词“清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”。贺铸初为武官，任侠豪纵，后改文职，家富藏书。徽宗时厉行党禁，但他仍与苏门人物多有往来。贺铸长于度曲，“大抵倚声而为之词，皆可歌也”^②。盛丽、妖冶、幽洁、悲壮，众体皆备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论及北宋后期的词，推他与周邦彦并能“卓然自立”。

由“熙宁变法”引发的新旧党争，历时半个多世纪，直至北宋灭亡。新旧两党更迭执政，每以“文字讪谤朝政”的名义打击政敌。哲宗绍圣（1095—1097）以后倡导“绍述”，对参与“元祐更化”的官僚尽行贬谪，投荒万里。苏轼远窜海南，黄庭坚、秦观并死于流放之中。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立“元祐党人碑”，苏轼及苏门人士，一律定为“奸党”，诏毁三苏、黄庭坚、秦观文集，尽毁苏轼所撰碑刻，收藏元祐党人信札乃至片纸只字，都要受到株连。党祸连结，大狱屡兴。本来蓬勃兴盛的北宋学术文化受到严重摧残，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大的厄难之一。

北宋后期的学术文化虽然衰落，但词作为“政（和）、宣（和）风流”的标志之一，继续得到发展。这个时期独步词坛的，则是周邦彦。周邦彦在政治分野上，与苏轼等人不同。早年作《汴都赋》歌颂熙宁、元丰的新政。元祐时期出京为地方官吏，徽宗时回朝，在崇宁、大观制礼作乐的气氛中，任仪礼局检讨详定礼制，又提举大晟府审定乐制，卒时离靖康之变不过五个年头了。周邦彦“负一代词

名”^{②4}。他善于创调，严于持律。《清真集》所用八十余调，新创的凡四十调。清真词调，声情谐婉，律切精严，多为南宋姜夔、吴文英等词家所承袭。其次，博采众长，熔铸得法，融化唐诗而别创词境，是周邦彦词的又一个突出特点。清真词富艳精工，明丽秀洁，用语典雅，字面雕润，“下字运意，皆有法度”^{②5}。南宋后期词人，就多师承清真，精研词法。作为北宋词的殿军，周邦彦起着“结北开南”的作用，是南北宋之间词脉传递交替的关键人物。由于周邦彦流风可仰，沾溉多方，历来被推为词中“集大成者”（秦观《韩愈论》以韩愈为文中集大成者，杜甫为诗中集大成者，周济《宋四家词选序》则以周邦彦为词中集大成者）。王国维《清真先生遗事》称周邦彦为“词中老杜”，亦承此而来，或许失之过誉。

崇宁四年（1105），宋徽宗采用魏汉津乐律之议，铸鼎定乐，设大晟府作为朝廷音乐机构，大晟府制定的乐律、乐舞是属于雅乐系统的复古模式，与宋代流行的俗乐趣尚不同。大晟府所撰乐曲，仅有数曲用作词调，此后无人继作。后人每以大晟府与唐玄宗所立教坊相提并论，并以周邦彦所用词调出于大晟曲，这是不了解大晟曲性质所导致的误解，周邦彦词大都作于他六十二岁提举大晟府之前。《清真集》中，几乎没有一首词可定为大晟曲的。供职于大晟府的，另有徐伸、田为、姚公立、晁冲之、江汉、万俟咏、晁端礼等数人，被称为“大晟词人”。万俟咏的《大声集》由周邦彦作序，集中词分应制、风月脂粉、雪月风花、脂粉才情、杂类等五体。这种分类内容正反映了北宋末年的词坛风尚。

1126年的靖康之变，划分了南北宋两个时代。身丁其运的词人中，涌现了不少背负着时代苦难的杰出歌手。他们的词从汴京旧唱转为楚奏吴歌，反映了犴下承平到中原沦陷又到南渡乱离的沧桑变故，前后词风明显更化。向子諲词集《酒边词》，就分为“江南新词”与

“江北旧词”两个部分，体现了南北宋之际的词风交替。张元幹为向子諲之甥。他作于北宋末年的词，肩随秦观，清丽婉转；南渡后一变而为慷慨悲凉，抑塞不平。《芦川词》二卷，以赠胡寅、李纲的二首《贺新郎》压卷。垂暮之年不惜获罪除名以抗击秦桧的投降政策，代表了爱国者的正义之声。朱敦儒的词集原名《太平樵唱》，然而回荡着凄怆的乱世之音。朱敦儒一面放浪江湖，笑傲尘世，颇有潇洒出尘之姿；一面又以“一双新泪眼，千里旧关山”的故国之思，在词中构筑他的“东京梦华录”。南宋后期的江湖派词人，就没有类似的心情，远不及朱敦儒的沉博厚重。把朱敦儒看作超然世外的隐逸词人，显然对他的内心悲苦缺少了解。陈与义南渡后官至参知政事，卒谥文正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以他追配黄庭坚、陈师道，列为江西诗派祖述杜甫的三宗之一。但是经过了战火的洗礼，陈与义的《无往词》中，就找不到昔日黄、陈乐府那种柳亸莺娇的影子，清婉之思出之以苍劲之笔，透露出对旧京词坛的一种反省。

李清照的词同样说明了时代剧变所留下的深刻烙印。由于门第家世和闺阁身份，李清照早年优游于浓郁的学术和艺术气氛中，她的词具有优雅的林下风范。接着经受国破家亡的浩劫，为金人铁骑所驱赶，飘泊东南，流离失所，最后竟莫知所终。她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精神打击，在这之前是难以想象的。李清照才华出众，诗、文、词三者俱工。残存的若干诗篇与引起争议的《词论》，都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锋芒。可惜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的《李易安集》十二卷，未见传世。据后人所辑的四十余首词来看，李清照固然不屑于以词作长短不茸之诗，也没有横放排奭、违反自己的论词宗旨，她的词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婉约风格。然而这种传统的婉约风格，在李清照手里也得到了新的提高和深化。李清照的前期词以空灵飞动的笔触自写闺阁情怀，洗尽铅华，自然高雅，本与小晏秦郎的笔致不同；她的后期词虽然仍以个人不幸为主，但这种个人不幸是和时代不幸紧紧融合在一

起的，因而格外地深沉厚实，艺术上也更有动人的力量。词所应有的时代特色，和李清照个人独创的艺术特色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这是李清照对推进和充实传统词风所做的贡献。

反映南渡初期词风变化的，还有李纲、赵鼎、李光、岳飞等一些名相名将的词。李纲在北宋末南宋初两度为相，是名望很高的抗战派旗帜。赵鼎、李光在宋高宗时担任过正、副丞相，都因反对秦桧和议而被罢黜放逐。岳飞为“中兴四大将”之一，屡立奇功，终因遭高宗、秦桧之忌，被害于大理寺风波亭。这几个人的词数量不多，他们也不以词名家，然而或凛凛生气，或忧愤深广，同是在民族存亡的历史背景下，词中出现的新的因素，使南宋词有个光辉的开端。

词至北宋而始极其工，至南宋而始极其变。南宋词是北宋词的继续。在北宋词已经盛极难继的情况下，“不有新变，何以代雄？”南宋词的再盛，就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向的；不是因袭的，而是多变的。南宋一个半世纪中，词人众多，名家辈出。嘉定间长沙刘氏书坊刻《百家词》，北宋二十三家，南宋六十六家。淳祐九年（1249）黄昇編集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各十卷。其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序》云：“中兴以来，作者继出。及乎近世，人各有词，词各有体。知之而未见，见之而未尽者，不胜算也。暇日裒集，得数百家。”东坡词一变而为稼轩词，清真词一变而为白石词，再变而为梦窗词，同样是南宋词多向而多变的证明。后世不断有作词须宗北宋还是须宗南宋之争，说明南宋词的成就足以向北宋词挑战。

南宋词的再盛，大体集中在两个时期。周密《武林旧事自序》认为：“乾道、淳熙间，三朝授受，两宫奉亲，古昔所无。一时声名文物之盛，号‘小元祐’，丰亨豫大，至宝祐、景定，则几乎政、宣矣。”乾道（1165—1173）、淳熙（1174—1189）是宋孝宗的年号。宋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君主，即位后起用抗战派而为岳飞平反，一度支持张浚北伐，政局一新。陆游、韩元吉、范成大、杨万

里、张孝祥、辛弃疾、姜夔等相继而起，士气峥嵘，创作旺盛。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，确实可以和北宋的元祐文学分庭抗礼。称之为“小元祐”，还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。宝祐（1253—1258）、景定（1260—1264）是宋理宗的年号，下距南宋之亡不过十余年。然而文期酒会，红字香词，依然是歌舞升平的景象。这个时期的主要词人，有刘克庄、吴潜、吴文英、杨缵、周密等人。他们的词，在风流俊赏之余，也隐约透露了南宋末年的时局危机与忧患心情，与北宋政和、宣和间的风尚已经有所不同。此外，宋亡以后的遗民词为数众多，也有其重要地位。张炎、王沂孙、刘辰翁、汪元量等都由宋入元。这些词人处于宋元之际，所作已多在元初。但他们的词历来被作为宋词的一部分，是南宋词最后的光焰与尾声。

辛弃疾在南宋是领袖一代的大家。南宋的爱国词派，由辛弃疾执其牛耳，张孝祥、陆游、陈亮为其羽翼，刘过、黄机、刘克庄以及宋末的文天祥、刘辰翁等为之后继，阵营壮大，相承不绝，成为南宋词的主流。

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。他是以恢复中原自任、气节功名自许的“一世之豪”。从他的《美芹十论》以及治军、治狱、办理荒政等出处大节中，都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才略。王士禛《倚声初集序》把唐宋词人分为四类，“有诗人之词，唐、蜀、五代诸人是也；有文人之词，欧、秦、李诸君子是也；有词人之词，柳永、周美成、康与之之属是也；有英雄之词，苏、陆、辛、刘是也。”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辛弃疾像曹操一样能文能武，胆略过人，他的词确实称得上“英雄之词”。刘过《沁园春》“寄辛稼轩”：“中原事，纵匈奴未灭，毕竟男儿。”谢枋得《祭辛稼轩先生墓记》：“公有英雄之才，忠义之心，刚大之气。”这些都是读稼轩词首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的。陈亮《辛稼轩画像赞》感慨于“真虎不用，真鼠枉用”的朝廷政局，则是辛弃疾壮志未酬的莫大悲哀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谓“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”。词中的苏、辛派，既维护词的本体，又致力于词的改革。辛弃疾以炽烈的爱国热情和饱满的斗争精神倾注于词，把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重大的主题带进了词，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辛弃疾南归四十余年中，有二十年投闲置散。即使流转于各地任上，亦用非所长，有违本志。因此辛弃疾的词，有的英声壮慨，喑鸣沉雄；有的摧刚为柔，缠绵悱恻；有的英气内敛，郁怒清扬；卷舒自如，不主故常。像《摸鱼儿》（更能消几番风雨）这类的词，肝肠似火，色笑如花，含刚吐茹，侠骨柔肠，艺术上臻于上乘，更是后来词家所难造之境。

姜夔词的创作年代，与辛弃疾相若，但两家词趋尚不同。姜夔于稼轩词酣畅淋漓之外，另立一宗，向风慕义者一时蜂起，形成了南宋后期左右词坛的又一重要词派，其影响一直下及于清初的浙派词。朱彝尊《黑蝶斋诗余序》曾述姜夔一派的大略：“词莫善于姜夔，宗之者张辑，卢祖皋，史达祖，吴文英，蒋捷，王沂孙，张炎，周密，陈允平，张翥，杨基，皆具夔之一体。”

张炎《词源》指出姜夔词的特点，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。”南宋词人鉴于北宋词尤多俗艳，倡导“复雅”，不少词集遂以“雅词”为名。姜夔的骚雅正是南宋许多词人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清初的浙派词，即因姜夔“句琢字炼，归于醇雅”而奉为宗师。姜夔的词，韵度胜绝，意趣高远，为宋词带来了新的意境和格调。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，还有十七首词旁注音谱，是宋代流传至今惟一完整的词乐文献，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，已经可以解读而仍无法演唱。

吴文英的词重在研练。“词家之有吴文英，如诗家之有李商隐”^{②6}。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记载吴文英讲论作词之法，认为“词之作难于诗”，词须协于音律，用字典雅，还要有“深长之味”与“柔

婉之意”。姜夔的清空，吴文英的密丽，同前此的婉约、豪放诸体一样，都是宋词中重要的风格流派。密指其立意深远，用笔幽邃；丽指其隽句艳字，芳悱铿丽，沉思翰藻，瑰丽奇谲。其实梦窗词除了密丽的一面，还有疏快空灵的一面。自清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推选吴文英为“领袖一代”的四家之一后，晚清以来崇尚梦窗词的风气愈来愈盛。朱孝臧《宋词三百首》选梦窗词二十五首，超过柳、周、苏、辛，所选密丽为多；郑文焯《宋十二家词选》则特选其空灵诸作，二家着眼点各有不同。

宋元之际的词，主要有两派。文天祥、刘辰翁发扬苏、辛词风，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谨持周、姜衣钵。文天祥的词，如同他的《正气歌》，风骨甚高，亦有境界。刘辰翁于宋亡后，隐居庐陵山中。他的词胎息苏、辛，间有轻灵婉丽之作，下开元词。周密的《蘋洲渔笛谱》，都作于宋亡之前，入元后的词，保存不多。他所选的《绝妙好词》七卷，则是南宋词的一个有名的选本，选录了不少宋元之际的词人词作。张炎卒时，离宋亡已四十余年。姜夔一派通过张炎影响及于元初的陆文圭、张翥等人。清代的浙派则以姜、张并称，出现过“家白石而户玉田”的盛况。张炎还著有《词源》一书，以为词出于乐，指示了研究南宋词乐的门径。王沂孙以咏物词著名，借物言志，重在寄托。辑周密、王沂孙十四人所作的《乐府补题》一卷，则是遗民们的一部咏物专集。咏物词北宋不多，南宋姜夔以后创作遂盛，宋末则大畅其风，反映了当时的词风趋向。借助咏物用以表达遗民心情，不失为抒情词的一种辅助手段。

三

选录宋词，自宋人始。北宋已有《兰畹》《聚兰》诸集。南宋编

集的《乐府雅词》《草堂诗余》《花庵词选》《绝妙好词》等选本，各有其文献价值。然而大都门庭未广，不足以观通变。清代的著名词选，朱彝尊《词综》备而不精，张惠言《词选》精而不备。按照现代观点精选一个宋词读本，就很必要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有关唐宋词的选本，不下数十种，大都取精用宏，具有通识。本书从二万多首宋词中选录四百余首，历代传诵与诸家所选的名作，尽可能囊括在内。入选的名家名作，不但出类拔萃，艺术精湛，还可借此看出词在两宋各个阶段的发展脉络，附录部分，上起于唐，下迄于清，以便从中了解千年词史的大致轮廓和总体面貌。其中金词与南宋词，一行于北，一行于南，本是属于同一历史时代的作品。南宋有些选本已将宋金词合选，是个可取的做法。清词超轶元明，直逼两宋，号称词的“复兴”。叶恭绰《全清词钞》所收，已达三千余家。目录正在编纂的《全清词》，涉及词人则已逾万。清词的一些大家名家，艺术成就并不逊于宋人。对于清词的研究，现正日渐开展。本书选录清词较多，希望引起读者的重视和研究兴趣。

又，研究生傅明善君曾参与本书的撰写工作，特此说明。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于杭州大学

注释：

- ①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。
- ②苏轼《书游垂虹亭》。
- ③苏轼《和致仕张郎中春昼》。
- ④张先《碧牡丹》词。
- ⑤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卷一。